

强监管 防风险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张庆君 邵磊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从短期看,要提振市场信心,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从长期看,既要培育高质量市场主体,提升金融风险抵御能力;又要健全监管内核,预防金融风险跨域传染。因此,应结合长短政策综合施策,形成合力,从而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提振市场信心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市场信心至关重要。在整个金融系统来看,信心是影响金融系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基调下,信心重比黄金,而提升市场信心的关键在于引入增量资本,合理引导投资者预期。

协同发力,引入市场增量资金。首先,引导市场主体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信贷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满足市场主体融资需求,推动市场主体融资成本持续下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其次,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股权融资渠道的拓宽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进一步优化我国资本市场融资结构,更好地缓解融资约束。在实现逆周期调节的同时,有利于提振优质企业市场价值,助力股票市场行稳致远。最后,加强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间的良性互动,适度提高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引导预期,防范市场异常波动。首先,保障存量政策的延续性,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稳健的政策是市场主体的定心丸,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外资持续性流入意愿。其次,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防范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金融系统平稳运行。只有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区间内保持基本稳定,才能积极引导外资预期。最后,拓宽信息披露途径,加强政策沟通。强化媒体及数字化渠道的信息披露,减轻市场主体因信息不对称诱发的非理性预期行为。

稳步开放,提升市场吸引力。一方面,要着力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在加大对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跨境投融资支持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疏通跨境贸易企业投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堵点,加强跨境贸易投融资政策宣传力度,持续优化跨境投融资业务流程,拓宽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满足企业跨境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既要稳字当头,做好战略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稳步开放,又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以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兴业,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现代化水平。

优育市场主体 提升金融风险抵御能力

强化金融服务的功能,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做强做优现代金融机构可以有效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对优化金融与实体经济间耦合协调机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进而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提升金融机构整体实力,二者共生共荣增强金融风险抵御能力。

稳定基础,打造现代银行业体系。首先,做强做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做强做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与效能,还能在资本市场发生波动时承担“稳定器”与“压舱石”作用。其次,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政策性银行要通过完善自身组织架构与激励机制,积极服务民生与国家战略,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提供金融支持。最后,突出中小金融机构经营特色。中小金融机构应与大型金融机构形成差异化发展,突出自身经营特色,完善公司治理与风险防控机制,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

优势互补,培育发展现代非银金融机构。一方面,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是引领长期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头部投资机构与中小投资机构要走好差异化发

展道路,进一步提升头部投资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引导“聪明资金”进入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实体经济发展韧性。另一方面,培育发展现代保险机构。保险是现代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对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保险机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保证保险资产安全,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练好内功,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首先,着力培育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亟待培育优质创新型企业,转换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次,增强上市公司业绩弹性,优化资本结构,拓宽企业成长空间。上市公司成长性是其估值提升的重要基础,上市公司应苦练内功,提升核心竞争力。再次,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建立多元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拓宽投资者沟通渠道。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能大幅降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间的信息错配程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最后,注重市值管理,上市公司要树立合规的市值管理理念,提升公司内在价值,提高投资者回报。

健全监管机制 预防金融风险跨域传染

针对金融风险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等特征,应从预防金融风险、阻断风险传染与日常合理避险三个方面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全面加强监管效能,防范潜在金融风险。首先,注重监管协同性。鉴于金融风险复杂性的特点,监管机构应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等方式,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以便更好地应对金融产品创新与跨市场风险。其次,增强监管有效性。做好金融安全统计监测与预警体系建设工作,提高风险精准识别能力。做好风险阻隔预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作用。继续维系货币政策的稳健性,稳定预期,消弭市场外部风险,同时强化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穿透式监管,避免发生系统性流动性风险。最后,提高监管适应性。要及时弥补监管空白,健全相关金融领域监管法规。

加强重点领域监管,稳妥化解局部风险。一方面,增强地方债务风险监测与识别能力,稳妥化解地方债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分析评估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环节,其关键在于建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载体,应优化城投平台市场化管理机制,引入市场化约束机制,加快地方城投平台有序整合和优化发展,防范地方债务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促进金融与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要加强国际合作与监管互动,密切关注国际上宏观审慎监管的最新动态,并结合我国房地产金融的实际情况,对潜在风险进行前瞻性监管,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外溢。

强化突发风险应急机制,防止风险跨域传染。首先,加强声誉风险监测预防。信用社会对金融企业风险信息的容忍度较低,声誉风险的发生将给金融企业带来较大影响。建立健全声誉风险传染预案,及时处置点状风险,阻断声誉风险的传染效应,避免个体风险转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设立信息危机公关机制。重点防范并处理突发性负面新闻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时发布公告声明,削弱风险网络舆情造成的负面影响,警惕负面信息传播引致的恐慌情绪蔓延。再次,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建立完善的舆情监测系统。通过实时监控网络金融风险数据,分析并预警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网络舆情,防微杜渐。最后,提高金融机构危机公关能力,与新闻媒体搭建良性互动关系,发挥金融机构与媒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共同构筑信息危机处理机制。

(作者分别为天津财经大学金融与保险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意识形态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视野进行战略定位,指出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在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诸多因素中,认同问题始终居于重要位置,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是认同层面的危机挑战以及意识形态间的认同竞争,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态度程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安全基础。认同具有主体性和可塑性,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需关注客体即受众的核心需求。检验意识形态工作是否落实到位、有所成效,关键要看主流意识形态凝心聚魂的价值引领和功能发挥的效果。意识形态建设须关注受众对象的内在反应,其中认同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意识形态认同程度及趋向的标准考量,是判断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尺。

认同度反映了意识形态满足民众需要的程度。意识形态在表面上是以思想、观念或精神层面的抽象存在,但它之所以能对民众产生吸引力、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则是因为其包含着根本意志和利益支撑,具有实践性、现实性的特征。首先,意识形态反映和表征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和精神追求。从形成根源来看,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引导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展状况的功能发挥来影响和争取、引导和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认同。从意识形态运行规律考察,民众一般是在自身利益需求不断得到反映与满足的状态去完成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接受、认可,其认同度受到共同利益和现实发展的间接驱动。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需关注客体即受众的需求。只有当意识形态立足日常生活世界,贴近民众实际生活,与其利益、愿望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时才能真正发挥整合社会心理的效应。其次,夯实意识形态认同得以实现的利益支撑。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人民群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大受益者,才能厚植民众对于国家发展模式和制度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在方法、内容和形式上满足社会成员对于共同利益的需求,才能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理解、支持和认可。

认同度体现的是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程度。内化是认同的客观过程,认同作为个体意识在心理情感层面的表达呈现,具有主客体之间互动性、塑造性等客观特征。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由基本认识到逐步消化再到接受转化的内化过程,是判断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维度。第一,认知是内化的前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能力影响其认知水平及认同程度。能否全面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及核心构成,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根基,这是反映社会成员意识形态认知水平的重要依据。第二,消化是内化的关键,将主流意识形态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与自身既有的认知结构实现交互并转化,是反映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环节。个体通过认知获得的观念内容往往处于初始的感性阶段,不能决定其最终的认同程度,只有通过一定的渠道媒介从感官到心理逐次深入,辅助民众将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内容加以理解共鸣并自主消化,才能作为其理性认识的客观体现于意识形态认同度的考察衡量中。第三,接受是内化的目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是其内化程度的最终体现,显示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认同度。判断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既要看是否将主流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共同利益目标以个体理想信仰的形式进行确立升华,又要从行为活动方面具体考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外化,从而由内而外地科学评价民众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所处的不同内化阶段能够体现出个体意识形态认同的程度差异。内化不是盲目地服从接受,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标准作为转化基础和接受程度所在层次区别,关乎其自身思想观念、信仰信念、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吸收内化抑或

认同度是判断意识形态工作 效果的重要标尺

吕建明 王洪超

消解分化,最终以意识形态认同度的结果差异得以评价呈现。认同度关系着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奋斗目标。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服务全社会共同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机理,本质上是通过民众社会心理塑造社会精神面貌的过程。具体来看,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有利于破除社会层面的信仰危机,从而树立共同的理想目标,进一步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以科学理论形成指导整合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强大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治国理政思想融入通俗形象的方式清晰表达出来,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和强烈认同,也激起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起到了凝心聚力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是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把民众的需求转化为政党的理念、目标而制定的符合实际的施政方案,是人民群众置身其中、共建共享的奋斗路线图。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动员、团结新时代的每个中国人为实现国家发展的美好前景而奋斗,至信而深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经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认同为基础,才能转化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

广泛认同为赢得民众的信任奠定深厚的情感基础。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民众心理层面的主观反应,不仅包含理性层面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契合,并且涉及感性层面的情感感召和情感共鸣。其一,情感共鸣能够为个体和意识形态之间提供缓冲的保护带,从而获得其对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坚守。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有利于培育民众对于国家和社会积极稳定的正向情感。认同为个体提供着客观认知的积极情感因素,能够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驱动个体以自觉主动的态度把握事物的本质及规律,进而在探索和深化真理性认识的同时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感知。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有利于化解民众的消极情感,更好发挥其催化驱动的正面效应。情绪情感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波动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意识形态认同是建立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真理性基础之上的,因而成为抵御消除民众误解的根本力量。实际上,民众对于共同理想、价值观念等内容的接受认同,必然在情感上产生对相应意识形态的信任与亲近,对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产生价值感和归属感,进而形成建设共同理想家园和精神世界的持久动力。其二,共同的情感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生活基础。意识形态是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利益、愿望和生活关系进行提炼的个体性观念,它一经产生就具有整合、重塑社会心理的作用,并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思想共识。只有当主流意识形态与普遍的社会心理相适应时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凝聚共识、维护民众利益的功效。主流意识形态要有效地整合社会,需从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转向普通大众的微观具体生活,通过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听得懂、记得住、信得着、用得上”的深切体认中不断提升民众的信任感和信赖度。从政治思想理论转向日常精神世界,与社会大众的现实感受、生活理想、价值期待统一起来,逐渐转化为大众日常生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生活以群众利益不懈奋斗的实际行动与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的同时,群众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过程中形成了对党的情感认同,从而在内心深处接受党的思想主张,深植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作者分别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8YJC810003),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BJXG19-004)阶段性成果】

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打造世界一流绿色港口

侯小菲

减污降碳成效显著。

二、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加快世界一流绿色港口建设

天津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政策体系支撑作用不足、绿色能源转变尚需加快、绿色枢纽建设创新不够等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新征程上,需要顺应绿色低碳发展新趋势,更好地发挥绿色港口的引领作用。

建立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天津港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支撑体系,完善港口节能减排的法律政策标准,保障绿色港口节能减排的建设和发展,研究制定《天津港绿色低碳港口建设规划》,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到港口规划、建设和运营全过程,促进港口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二是完善天津港、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加强能源集中管控和能源使用管理信息化。开展企业碳足迹核算,明确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推动企业更好地采取减排行动。三是加大监管力度,严格管控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危害的污染项目,通过绿色补

贴、税收减免等措施激励港口及临港企业绿色项目和技术研发投入。鼓励企业与政府、科研院所合作,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绿色港口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制定阶段化绿色转型方案,积极参与港口环境建设。

建设绿色港口“智慧大脑”。一是应用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整合港口、航运、贸易等数据,建设港口“智慧大脑”。推进港口、航运、铁路、公路等数据互联互通,持续推行港口作业单证“无纸化”、全程服务“一站式”,提高物流便利化水平。二是建设基于5G、北斗等技术的信息基础设施,实现集装箱水平运输、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场桥/岸桥系统无缝对接。三是研发绿色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并推广应用,实现典型能源品种常规检测项目100%全覆盖。搭建智慧环保综合管理平台,掌握港口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和处理结果,构建现状可查、风险可辨、未来可测的智能管控模式。

构建绿色低碳能源系统。一是严格落实船舶排放控制区要求,保持港口船舶硫燃油使用率100%、高标准处理港作船舶产生的污染物和生产、生活垃圾。二是依托向海优势,发展海洋风电、氢能、生物能源等新能源产业,构建“风、

光、储、氢”等多源融合的绿色低碳能源系统,推广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微电网应用,完成港区液化天然气、氢气、充电设施等配套设施建设,推动新增港口作业机械优先采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三是新改扩建码头工程同步设计、建设岸电设施,建立健全岸电使用制度和标准,实施现有设备整合、配套设施充分利用。

创新建设生态型海绵港口。一是提高港口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利用收集船舶的压舱水、净化的雨水、中水等水资源,建造人工湖和人工湿地生态圈,形成港口污水零排放、非常规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完整水循环生态系统,提升景观价值的同时兼具调蓄洪水功能,实现环境经济双效益。二是应用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创建生态型海绵港口。改造港区集装箱,采用下凹式箱区雨纳雨水,提升港区抵抗极端天气的风险能力,在生活箱区建设绿色屋顶、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海绵设施控制雨洪期间的径流、峰值和污染,对雨水进行消纳利用。

推动绿色供应链关键枢纽建设。一是建设数据集成中心,智能化匹配调度不同运输方式的集装箱型号,数据统一管理集装箱租赁业务与空箱调转业务,构建功能完备的智能化集装箱海铁联运体系。深入推进集装箱水中转,做强“公转铁、散改集”双示范,提高铁路、水路等绿色运输方式比例。二是充分发挥港口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关键节点作用,建立码头运营商、物流公司、托运人之间的沟通协同机制,灵活部署和调整运输方式,鼓励港口及临港企业与航运公司协同推进运输船舶低零排放燃料应用,打造“绿色航运走廊”示范。

【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22YZD-08)阶段性成果】